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 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关键词] 《春秋》;西周金文;编年体史书;大事系年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5)01-0122-11

历史,不仅仅是记述事件,还要有年代月日等时间因素。作为史学题材的书籍,第一要素就是要求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有确切时间语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最早的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正式史书只能是《春秋》。章太炎曾说:“余讲《春秋》历四十年,尝谓《春秋》者,司马迁、班固以前惟一之史也。《春秋》未作,世无正式之史。”^①此说诚是。人们常希望在地下能挖掘出一部春秋之前的史书来,以解决先秦史的年代学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事。尽管春秋时期各国皆有《春秋》一类的史书,就《墨子·明鬼下》所见就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但在春秋之前还不大可能有《春秋》这种史书体裁。《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

义则丘窃取之矣。”依后几句来看,《春秋》类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把史文、史事与史义融为一体^②;而从前几句看,是说在春秋时代用《春秋》这种体裁记述本国历史大事之前,各国盛行的只有《诗经》这类文学体裁形式。依据孟子所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结合古文献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数据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没有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

不过,从《尚书》和商周金文资料看,在商末和西周时期,虽然还未见正式史书——即专门记述历史的篇章或书籍,但是记述事件中用某王年月日来确定时间坐标的现象已经出现了,而且在传世的西周中晚期文献和金文资料中达到了鼎盛。同时,从西周早期金文和古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用大事系“年”的方式来标记特殊的年份。这种现象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只要把某君王的年月时日和当时的历史

[收稿日期] 2014-06-26

[基金项目]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关中地区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12&·ZD138)。

① 章太炎:《〈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② 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历史思维卷》,见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大事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像鲁国《春秋》那样的专门史书。因为《春秋》类史书的特点就是年、季、月、日的记时语词加上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

这就告诉我们,西周时期金文和古文献中出现的年月时日的记载和大事系年的现象,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很值得重视:尽管西周时期可能还没有像《春秋》那样的史书,但这种编年体类史记的记述方式及其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酝酿成熟了。

一、商末西周甲金文中记时语词盛行的史学意义

商末至西周时期金文中记事系“年”有两种情况:一是系周王之年月及其时日;二是大事系“年”的现象。前者学术界关注者比较多,只是对其盛行时代未加考察。商周甲金文中记载年、月、月相、干支日的现象,在西周特别是中晚期金文中达到鼎盛状态,不过记载干支、祀季、年、月则从晚商就已经出现了。

1. 商代末年占卜记事系商王月、祀季、年的甲骨金文

商代甲骨文一般是句首记载干支,在句末记载月份。例如:《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6片:“甲戌卜,宾贞:翌乙亥侑于祖乙,用。五月。”《合集》22741片:“癸酉卜,出贞:侑于唐,惟翌乙亥酒。六月。”这两片中头一片是武丁时期,第二片是祖庚祖甲时期。而到商末,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都出现了纪年的现象。

“……用。十祀。”(《合集》29714)

“甲午王卜贞:乍(作)余酒朕禾酉,余步从侯喜正(征)人方。……告于大邑商,亡咎(害)在猷?王占曰:吉。在九月,遯上甲亥,唯十祀。”(《合集》36482)

“甲午王卜,在瀋(次)贞,今日步于蕃,亡灾?〔在〕十月二,唯十祀多。”(《合集》41757)

“□□〔王卜贞〕,其正(征)孟方,吏(惟)今……受又(佑),不蒙灾?亡……〔王〕占曰:吉。在十月,王九〔祀〕。”(《合集》36517)

“……于惊录,获白兕,叙于……在九月,唯王十祀多日,王来正孟方白(伯)〔炎〕。”(《合集》37398)

小臣邑斿:“……唯王六祀,多(彤)日,在四月”(《集成》①9249)

亚鱼鼎:“壬申……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近出》②339)

觚:“丁巳……在九月,唯王九祀翌日”(《集成》5397)

康方彝:“己酉……才(在)九月,唯王十祀,翌日”(《集成》9894)

二祀邛其卣:“丙辰……唯王二祀”(《集成》5412)

四祀邛其卣:“……在四月,唯王四祀翌日”(《集成》5413)

六祀邛其卣:“乙亥……在六月,唯王六祀翌日”(《集成》5414)

小臣隹犀尊:“丁巳……唯王十祀又五,多(彤)日。”(《集成》5990)

上述商代晚期甲骨金文记述时间的方式一般比较完整的是“干支+月份+某王某年+祀季名”或“干支+月份+祀季名+某王某年”。从上面殷商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用“祀”来纪年的文字记述方式。上面商甲骨金文引文中“多”、“多日”、“彤日”、“翌日”、“翌日”是五种周祭方式中的祀名,甲骨文见于出组(第二期)和黄组(第五期)之中,金文见于晚商时期,用这五种祭祀方式把商代先王祭祀一周约在36到37旬之间,约有360~370天^③,便出现了用“祀”来表示一年的纪年法。

晚商殷墟卜辞和金文中在占卜和记事之后记月、祀季、祀来标识时间概念,这种情况反映了晚商人们对所记载事件有了比较强烈的时间意识,为后来西周金文记述家国事件时经常加上年、月、月相、干支日等时间要素开了先河。虽然这是史书中重要的一个要素,但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甲骨文、金文和《尚书》中的一些篇章,“这都属于官文书性质”^④。

不过,过去也有学者夸大了这种“官文书”的作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全八册),下简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 刘雨、卢岩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简称《近出》(共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91页。

④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用。如刘节先生曾说:“殷墟卜辞所记简单确实,三个要素(笔者按:指历史三要素时、地、人)都包括在里面,不只是包含三个要素,而且形式与《春秋》记事的例子很相近……这就是中国编年史的雏形……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编年史,殷代的卜辞是直接的渊源”^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殷墟卜辞是商王占卜的记录,商王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会记载,不分大小,很像后世的“起居注”形式,与“编年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把商代有年月日记载的甲骨金文与先秦编年类史书《春秋》和古本《竹书纪年》等作比较,从形式上看,的确历史“三要素”差不多是相似的,但实质上仍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主要表现在“事件”的选择上:《春秋》类编年体史书所记载的“事件”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事;而殷墟卜辞是商王身边的大小事几乎一律入载;殷卜辞中那种贞旬、商王出行、游猎之类,如无特殊原因,一般是不可能进入《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之中的。按《春秋》“常事不书”的书法,只有那种商末黄组中“正(征)人方”、“正(征)孟方”等才可能入选后世的编年体史书中。虽然甲骨文是重要的研究商代历史的原始史料,但说它是“中国编年史的雏形”还是不恰当的。

2. 西周时记事系周王之年的金文

(1) 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的金文计时方式还是用商晚期之法,一般把月份和干支放在篇首,记年的语词放在篇末。虽然“年”字已经出现了,但还是较少,记年语词还是多用“祀”。而且一般铭文是不用记年语词的,据我们统计,在大量西周早期的金文中,只有七次使用。

何尊:“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唯王五祀”(《集成》6014)

睪公簋:“唯王廿又八祀”(《考古》2007年第3期图版3.5)

王七祀壶盖:“王七祀,王铸”(《集成》9551)

作册鬯卣:“唯十又九年,王才(在)

序”(《集成》5407)

大孟鼎:“唯九月,王才(在)宗周……唯王廿又三祀”(《集成》2837)

小孟鼎:“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集成》2839)

作册旂尊:“佳(唯)五月,王才(在)序。戊子,令(命)乍(作)册旂兄(貺)聖^②土于相侯……唯王十又九祀”^③(《集成》6002)

从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中记“年”或“祀”用语较少且置于铭文之尾的情况看,这时记“年”或“祀”的作用不是很重要的,可能只是一种附记的性质。

(2) 西周中期

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时间用语在西周中期就越来越频繁了,表示时间概念的用语“年”、“月”和干支“日”也已俱全。不过在西周中期有时还有商末周初时记年用“祀”且放在文末的情况,如《集成》9898 吴方彝盖与《集成》6516 趯解中都有“唯王二祀”,恭王时期的五祀卫鼎有“唯正月初吉庚戌……唯王五祀”(《集成》2832),懿王时期太师虢簋有“正月既望甲午……唯十又二年”(《集成》4251)的记述。但绝大多数记载时间用语已经是放在句首了,且以“年十月十月相用语十干支”的方式表示。

吴方彝盖:“唯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室……唯王二祀。”(《集成》9898)

趯解:“唯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在)周……唯王二祀。”(《集成》6516)

齐生鲁方彝盖:“唯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齐生鲁肇贮(贾),休多赢。”(《集成》9896)

庚嬴鼎:“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格)琯(周)宫,衣(卒^④)事。”(《集成》2748)

匭伯再簋:“唯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

①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6—17页。

② 此字一般读为“望”,但其字上为“耳”下为“人”,见于甲骨文,应为“圣”字初文。参王晖:《作册旂尊铭与西周分封赐土礼仪考》,《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③ 作册旂方彝、作册旂觥与作册旂尊铭文同,见《集成》9895、9303器。

④ 李学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7页。

公蔑匚白(伯)再历。”(《集成》2748)

据笔者统计,西周中期具有记时用语的青铜器铭文有 37 例,年、月、干支日俱全的有 33 例,年、月、月相、干支日俱全的有 32 例。

西周青铜器铭文多数是当时贵族阶层记述自己因某事受到周王、诸侯或权臣的赏赐嘉奖的。他们记述自己亲历的大事时,往往要明确地把年月日和月相记载在前面,表明这时人们对时间概念的重视,初步感觉到了时间在历史长河纵向坐标中的重要意义。

(3)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与西周中期一样,一般都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用语放在句首,以“年+月+月相+干支”的方式表示,只有个别没有干支日或没有记载月相。

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乍(作)朕王母叔姜宝殷(簋)。”(《集成》4126)

无彘簋:“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尸(夷),王易(赐)无彘马四匹。”(《集成》4225~4226)

成钟:“唯十又六年九月丁亥,王才(在)周康宫,王亲易(赐)成此钟。”(《新收》1461)

克罇:“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宫。”(《集成》209)

酏从鼎:“唯三十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在)周康宫,王才(在)周康宫。”(《集成》2818,簋盖同)

据笔者统计,西周晚期具有记年用语的青铜器铭文有 51 例,年、月、干支日俱全的有 42 例,年、月、月相、干支日俱全的有 37 例。

这些记年月日的青铜器铭文中只有记年没有其他月、月相、干支日,而且是用“祀”来记载的反而是周厉王两件铜器:五祀𩇑钟记述有“……唯王五祀”(《集成》358);𩇑簋“……唯王十又二祀”(《集成》4317)。周厉王的这种记述时间的方式,只在商末和周初出现,西周中期以后就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周厉王所做之器有复古倾向。

这种在篇首记载年月等时间因素的情况在传世周代文献中也时有所见。如:《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逸周书·作雒》:“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

从这些情况可见,西周记述事件时体现时间概念的意识是大大加强了。时间概念是体现历史坐标的首要因素,尽管这时还没有何王何朝的记载,但大多数青铜器铭文中年、月、月相、干支日俱全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在记述历史事件时要努力体现时间概念的历史意识已经产生了。

另外,我们从前面金文的举例以及后面的附表一和附表二还可看到,在记载某周王年、月、月相及其干支日之后,常常还记述周王在何处活动的情况,如无彘簋“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尸(夷)”,酏从鼎“唯三十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在)周康宫,王才(在)周康宫”,师酉簋“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吴”^①。这些现象就像隋唐之后皇帝的“起居注”一样,把周王的起居活动情况记述得比较清楚。这表明从西周开始,人们就对周王的起居活动比较关注。这也就可以明白,春秋时期《春秋》类编年体史书是以君主为主进行记述的^②,但这种史书体裁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从西周金文的内容看,西周时期人们(特别是史官)关注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的历史意识在以君王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已经酝酿成熟了,这在西周历史大事系“年”的

① 这一现象在商末金文中已有所见,成嗣子鼎:“丙午,王商(赏)成嗣子贝廿朋……唯王饗鬯大室,才(在)九月,犬鱼。”(《集成》2708)此条既有“丙午”、“九月”等时间语词,也有“王饗鬯大室”的大事记载。

② 刘知几《史通·二体》云:“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见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刘知几所说编年体史书的优缺点是比较中肯的。编年体史书的特点都是围绕着君主或帝王而选择的军国大事,除此之外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进入不了其视野和范围,则是这种史学体裁的一大缺点。

金文资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西周金文所见大事系“年” 现象的史学意义

记载历史大事系“年”的现象在西周金文和文献已多有使用了。其中绝大多数用“大事+之年”或“大事十年”形式,也有用“遘于”或“会”的形式把金文中所记具体事件与当年周王朝发生的某件大事相呼应来标记某年。

1. 西周金文“大事+之年”的记年形式

麦方尊:“作册麦易(赐)金于辟侯,麦扬,用乍(作)宝尊彝,用猷侯逆舟(造),进(将)明令,唯天子休于麦辟侯之年铸。”(《集成》6015,西周早期)

中方鼎:“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肯(省)南或(国)串(贯)行,斂(艺)王应(位)。才(在)夔疇真山,中乎(呼)归(饋)生凤于王,斂于宝彝。”(《集成》2751,2752同,西周早期)

鼓罍簋:“□肇貺,累子鼓罍铸旅簋。唯巢来连,王令东宮追以六自(师)之年。”(《集成》4047,西周早期后段)

敦甗:“唯十又一月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王令中先肯(省)南或(国)毋(贯)行,斂(艺)王应。”(《文物》2007年第1期第65页图2,西周早期后段)

爰尊:“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从师雍父戍于聿自(师)之年,爰机(蔑)历,中(仲)竞父易(赐)赤金。爰拜稽首,对扬竞父休。”(《集成》6008,西周中期前段)

小克鼎:“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適正八自(师)之年,克乍(作)朕皇且(祖)釐季宝尊彝。”(《集成》2796~2802,西周晚期)

2. 西周金文“大事十年”的记年形式

厚趯方鼎:“唯王各(格)于成周年,厚趯又(有)饋(饋)于濫公。”(《集成》2730,西周早期)

小臣传簋:“唯五月既望甲子,王才(在)懿(方)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年,师田父令小臣传非余,传□朕考□,师田父令余嗣□官。”(《集成》4206,西周早期)

士上尊:“唯王大禽(禴)于宗周、延(誕)懿饗京年,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眾(暨)史黄寢(殷)于成周。”(《集成》5999,西周早期①)

作册舫卣:“唯明保殷成周年,公易(賜)乍(作)册舫鬯、贝。”(《集成》5400,西周早期后段)

旅鼎:“唯公大(太)保来伐反(叛)尸(夷)年,才(在)十又一庚申,公才(在)蓋自(师)。”(《集成》2728,西周早期后段)

上述这两类“大事+之年”或“大事十年”的纪年方式,皆是在记述一件大事之后附加上一个“年”或“之年”,表示一个特定的年份里发生了某一件大事。从语法关系看,“之年”或“年”前面本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这时只作为一个主谓句去作它的定语成分。如:中方鼎铭“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中的“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本是一个主谓宾俱全的完整句子,但后面附上“之年”后,就变成了修饰“年”的定语成分。旅鼎铭“惟公大(太)保来伐反(叛)尸(夷)年”中“唯公大(太)保来伐反(叛)尸(夷)”本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后附一个“年”字,便变成了修饰“年”的定语成分。王国维曾说:“云‘国差立事岁’者,纪其年也。古人多以事纪年,如南宮方鼎云‘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克鼎云‘王命克舍命于成周適正八自之年’,皆是。”②可见王国维已经认识到这种“岁”或“之年”是用来纪年的,但他可能是限于跋文的体例,并未就这种现象进一步分析其历史意义。

西周金文中这种大事系“年”的铭文内容,有的与系年之大事有密切的关联;有的只有一定的关联,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说明铭文内容发生的时间和背景;有的二者之间则关联不大,只是通过大事系“年”把铭文所记内容的时间充分彰显。上面引述的铭文内容与所记大事系“年”有关联的有麦方

① 士上卣、士上盃铭文与士上尊同,士上卣铭文见《集成》5421~5422,士上盃铭文见《集成》9454。

② 王国维:《齐国差簋跋》,见《观堂集林》,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7页。

尊、中方鼎、小克鼎、小臣传簋、爰尊等；二者之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只是一种旁涉关系的有土上尊、作册鬲卣、鼓鬲、旅鼎等；至于鼓鬲簋所说“□肇贮，眾子鼓鬲铸旅簋。唯巢来迓，王令东宫追以六白(师)之年”、厚趯方鼎“唯王各(格)于成周年，厚趯又(有)償(饋)于湛公”，铭文的内容与大事系“年”的语词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是用大事系“年”给铭文内容一个更加明确的年代。鼓鬲簋“□肇贮，眾子鼓鬲铸旅簋”乃铭文的内容，“唯巢来迓，王令东宫追以六白(师)之年”与此簋的内容无关，只是说明一个铸造此簋的确切年代。后者这种大事系“年”旨在表示一定时间概念却与铭文内容无关的现象，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好反映了西周时代的人们已经具有了很明确的关心大事件与年代的历史意识。

不仅周代金文，在记述商周历史的其他先秦古文献中也有不少以大事系年的情况。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尚书·金縢》）

“既克商”、“周公居东”都是周初的大事，是可以用来表示重要年代的明确标志。在其后加上“二年”的年限，就可表示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观念。即使在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均有史官来写《春秋》类史书而纪年比较完整准确的春秋时代，这种大事记年的方式仍被使用，不过多用“岁”来替代“年”字。请看《左传》的用例：

襄公九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

襄公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邾。其五月，秦晋为成。”

襄公二十六年：“齐人城邾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廩丘奔晋。”

襄公三十年：“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邾成子于承匡之岁也。……’”

昭公七年：“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媿始生子，名之曰元。”

昭公七年：“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

有介而行。……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

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苾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

在春秋时期的金文中也有这种记述历史大事而系“岁”的现象：

国佐饔：“国差(佐)立(莅)事岁，咸月丁亥，攻(工)市(师)何铸西墉宝饔四乘。”（《集成》10361，春秋中期）

公子土斧壶：“公孙灶立(莅)事岁，饭耆月，公子土斧乍(作)子中(仲)姜簋之般(盘)壶。”（《集成》9709，春秋晚期）

上列《左传》中加点的语词是以大事记年的例句。“会于沙随”、“传会于夷仪”、“齐人城邾”、“鲁叔仲惠伯会邾成子于承匡”等都应是春秋时期一些大事，所以都被用来作为记年的标志。因此《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会于沙随之岁”曰“沙随在成十六年”，亦即在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杜注《左传》昭公七年“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云“在二年”，意即此事发生在鲁昭公二年（前540）。同时，我们还可看到，古文献中还有以大事记月的现象，如上引《左传》昭公七年“齐燕平之月”。

与前面所引西周金文用例不同的是，春秋时金文记载历史大事系年，都是在某一件事后附以“之岁”或“岁”，这实际上表示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已经观察到岁星（木星，西方称为Jupiter）接近12年在天空视运行一周的规律^①，所以“岁”便被用来作为纪年的名词。春秋时以“岁”代“年”的便在有的国家出现了，战国时就产生了大事系年不用“年”而用“岁”的现象，有历史大事系“之岁”的形式来记年，也有像楚国、齐国用某权臣“立(莅)事岁”的形式来记年。李零曾分析楚国竹简中这种“以事记年”之习，说：“这种记年之事不会正好发生在岁首，而是该年的一种代表性事件。”^②这是对的。这种“以事记年”的形式，大概反映了战国这样一个特定

① 木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4332.589天，约合11.86年，接近于12年在星空运行一周。古人又把星空黄道的星宿划分为十二次，岁星前进一次为一年，因此岁星便被用来纪年。

②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1页。

时代的特点,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周王”名存实亡,不便以周王室历法来纪年,以各诸侯王来纪年也缺乏统一性,不如以历史大事来纪年以明确标识某事发生的年份,这样会使人记忆犹新。

西周金文中这种在某件军国大事后面系年的方法,与古希腊列斯波斯人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约前480—前400)使用城邦主要执政官员和大祭司以及体育比赛冠军的名字纪年方法一样^①,对历史学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在某个重大事件后缀“年”、“之年”或“岁”、“之岁”,也许比那种不知何王的某年某月某日的记载更有年代学意义,也更能凸现历史价值。这种记年形式即使在近现代也时有使用:比如“鸦片战争年”、“辛亥革命年”、“抗日战争爆发年”、“文化革命十年”等,比具体某年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勾起久远的记忆。在此基础上,只要加上年季月日的具体时间因素,编年体史著便会产生。

3. 其他用来记年的表示法及其历史意义

西周金文中还有其他用来表示记年的方法,这就是“具体事件+遘于+其年大事”或者“具体事件+会+其年大事”的形式。

保尊:“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征(诞)兄(祝)六品,蔑历于保,易(赐)宾,用乍(作)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迨(会)王大祀,祓(侑)于周,才(在)二月既望。”(《集成》6003,西周早期)

覲公簋:“覲公作郛(妻)姚毁(簋),遘于王令(命)易(唐)白(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𠄎。”(《考古》2007年第3期图版3.5,西周早期)

麦方尊:“王令辟井(邢侯)出坏(坏)侯于井(邢),零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迨(会)王寝懿京,𠄎祀;零若翌日,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集成》6015,西周早期)

上述记事方式,是表示作器者自己做成某器及原因,或者是自己经历某件大事,然后用“遘于”或“𠄎”(会)与当时周王朝所发生的一件或两件大事相联系^②。如作于周初成王时的保尊以及保卣(《集成》5415)铭文,记述了周王命保去殷见东国五个侯国,并且赐赏东方五个诸侯“六品”礼物。王因此对保“蔑历”嘉奖,还把诸侯所贡献的物品赐给了保^③。铭文后面特意用“遘于”记述了这件事发生的一个特定的时间:“四方迨(会)王大祀,祓(侑)于周”。陈梦家曾指出这种方式是晚商的记时形式:“‘遘于’至铭末,为以事记时,和晚殷的刻辞相同”,不同的是,“依殷制,月名通常在‘遘于’之前,此则在后”^④。还应指出的是,这种用“遘于”来记时的形式,前面都是与作器者本人有关的一件事,是比较具体的个人事务,后面则是与朝廷国家相关的一件大事,把个人事务与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更容易引起自己和他人对发生时间的回忆,表明这件大事是用来记年的。

上引覲公簋与麦方尊铭文也具有这样的作用。覲公簋所述“覲公作郛(妻)姚毁”是涉及个人的小事,作器主人覲为其妻姚氏作了一件铜器,时间是周成王二十八年^⑤,故铭文后记为“唯王廿又八祀”。但作器者覲公还是觉得不足以完全说明其器制成的时间特征,而这一年确实有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即周成王封唐伯(叔虞)于晋,便记载说此

① 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② 这种用“遘于”来与当时一件历史大事相联系来记载的现象在殷商就出现了,例如:二祀卣其卣:“丙辰,王令卣其兄(祝)鬻于彛田(沟),宾贝五朋。才(在)正月,遘于妣丙日大乙夷。唯王二祀,既于上下帝。”(《集成》5412,商代晚期)肆吉簋:“戊辰,弼师易(赐)肆吉户囊贝,用乍(作)父乙宝彝。在十月一,唯王廿祀翌日,遘于妣(妣)戊、武乙夷,彛一,幸旅。”(《集成》4144,商代晚期)四祀卣其卣:“乙巳王口(曰):尊文武帝乙俎,在召大庭,遘乙翌日。……在四月,唯王四祀翌日。”(《集成》5413,商代晚期)父丁鼎:“乙□□□□金贝,□用乍(作)父丁彝,在六月,遘于日癸□日蒸。”(《三代》3.29.2,商代晚期)不过商代这种用“遘于”所连接的是商代祭祀父母祖妣的乡日、翌日等祀季,与西周以来用“遘”、“遘于”连接的王朝大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③ 陈梦家认为:“金文‘易’‘宾’虽皆为赠赏物品,但在用法上有别:‘易’为自上赏赐于下,‘宾’为侯伯奉敬于天子的使者。”(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页)此说可信。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8页。

⑤ 朱凤瀚:《覲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年第3期。

器做成“遘于王令(命)易(唐)白(伯)侯于晋”。而“遘于”之后的记述是一件涉及周王朝的军国政治大事,更易于为人们所熟悉,其标记时间作用十分明显而且重要,这样一来就把时间背景完全凸显出来。大概在作器主人看来,此器以及做成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也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但把此器的做成时间依附于唐叔虞封于晋这一大事的年代,人们会很容易地记住这一件作器的时间。同样,麦方尊铭中“王令辟井(邢侯)出坏(坯)侯于井(邢),零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也是一件具体事务,大概在当时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后面用“途(会)”所涉及的“王寝鬯(旁)京,彤祀;零若翌日,才(在)璧(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则是周王亲自主持的一件国之大典大礼,朝廷大臣皆知,适合作为此年的标志性事件,更具有纪年的历史意义。

由上可见,铭文内容与表示纪年意义的大事系“年”之间有的有内在关联,有的则关联不大。但标记时间作用的大事系“年”的历史意义尤其应引起我们注意。它充分反映了从西周时期起人们已经具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历史意识。其中,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

三、西周金文大事系年法与“春秋”类编年体史书的关系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专门性史书,体裁被称为“编年体”,实际上是一种以鲁国国君世系排列的、以年月时日为线索的历史“大事记”。杜预《春秋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①这就是说《春秋》一类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把“记事”和日月时年等“记时”因素相结合,“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形成了一种《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以《春秋》经隐公元年为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春秋》隐公元年这些记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时间语词,二是重大事件^②。从时间语词来看,都有春夏秋冬四季及月份的记载,但没有干支日期的记载。从大事来看,有“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郑伯克段于鄢”、“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及宋人盟于宿”、“祭伯来”、“公子益师卒”等。这些都是鲁隐公元年这一年发生在鲁国的大事。“王正月”后没有系事件,应是这一月没有大事可记而空缺。

比较起来,本文第一节西周中晚期金文中记载年、月、干支日的现象,如裘卫簋“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集成》4256)、裘卫盃“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集成》9456),第二节西周金文和古文文献“大事十之年(或‘年’)”之中的大事件,如中方鼎“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集成》2751,2752)、鼓罍簋“唯巢来连、王令东宫追以六自(师)之年”(《集成》4047),以及用“遘于”或“会”提及的周王朝发生的某件大事,如保尊:“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社(诞)兄(貺)六品,蔑历于保,易(赐)宾,用乍(作)父癸宗宝尊彝,遘于四方途(会)王大祀,菽(侑)于周,才(在)二月既望”(《集成》6003),与《春秋》中记事的方式相同。

如果把以上记有年、月、干支日的时间用语和下面大事系年中去掉“之年”或“年”字的那些大事件排列在一起,可以发现在西周金文中已经出现了与《春秋》基本一致的记述方式,请看:

小臣传簋:“唯五月既望甲子,王才(在)鬯(方)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年,师田父令小臣传非余(緋琫)”(《集成》4206,西周早期)

敦甗:“唯十又一月,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才(在)宗

① 阮元校勘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3页。

② 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也往往是以历史大事加上王侯之年的方式来记述。如:《初学记》卷七《地部》:“《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太平御览》卷二《天部》:“《汲冢纪年书》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不过与《春秋》不同的是,古本《竹书纪年》从夏商到战国魏襄王时,都是只有王君之“年”,而无时、月、日的记载。

周。”(《文物》2007年第1期第65页图2,西周早期后段)

爰尊:“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从师雍父戍于辟自(师)之年,爰蔑历,中(仲)克父易(赐)赤金。”(《集成》6008,西周中期前段)

小克鼎:“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适正八自(师)之年,克乍(作)朕皇且(祖)厘季宝宗彝。”(《集成》2796~2802,西周晚期)

可见,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记年记月甚至有记日及月相的时间语词,加上大事系年的方式,与《春秋》编年体的历史记载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西周早期成王时的鬲公簋铭中,把后面的记年语词“唯王廿又八祀”放在前面,再加上“遘于”之后这一年的大事“王令(命)易(唐)白(伯)侯于晋”,正是《春秋》编年体记载方式;而西周晚期小克鼎铭文中的“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适正八自(师)之年”,只要把“之年”删去,不就正像《春秋》述史笔法吗?至于西周早期到中期之间的小臣传簋铭中“唯五月既望甲子,王才(在)鬲(方)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年”、鞅卣铭中“唯十又一月,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爰尊铭中“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从师雍父戍于辟自(师)之年”,虽然没有记年语词,但所记大事之后有“年”或“之年”,也就等于有年岁的记载,因此这些记载也与《春秋》史体的记述方式相一致。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编著春秋类的史书,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的两大要素——时间语词和大事记——早在西周时期就酝酿成熟了。只要王室或公室安排史官记事,便会有古本《竹书纪年》、鲁《春秋》和《左传》类的史书出现。

从古文献和西周金文资料看,西周晚期已经把表示年月日时间的语词和军国大事结合在一起来记录历史了,但并未形成有体系的史书。

章太炎曾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元年,自尔至于鲁隐元年,凡一百十九年。史公但书某公卒,某公生,未尝著一事,其有纪事可知其国已有《春秋》矣。晋穆公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左传》不记其年,而《十二诸侯年表》明著之,盖列国之有《春

秋》,晋为最早,而秦、郑次之(《秦本纪》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宋在其后,齐、鲁更后。”^①晋穆公因条之役失败而给太子取名为“仇”,即后来的晋文侯;因千亩之战胜利而给太子之弟取名为“成师”,即后来的“桓叔”。此事见于《左传》桓公二年。但从《左传》的记载看,记述年、时、月、日和历史大事早在《春秋》隐公元年(前722)之前就开始了。

《左传》桓公二年说:“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昭侯”是晋文侯之子,“孝侯”是晋昭侯之子,“鄂侯”是晋孝侯之子。“惠之二十四年”是指鲁惠公二十四年,此年为公元前745年,晋文侯卒,其子昭侯即位,便把曲沃封给桓叔成师为封邑。“惠之三十年”是指鲁惠公三十年,前739年,此年晋昭侯被杀,晋孝侯立;“惠之四十五年”为前724年,晋孝侯被杀,晋鄂侯立。鲁惠公二十四年、鲁惠公三十年、鲁惠公四十五年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但和晋国发生的大事对应得如此清楚准确,应是当时有史书记载才有这种可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春秋诸侯“世家”把共和元年之后周王室和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国等各诸侯在位之年记载得很清楚,然所记诸侯列国的历史大事和鲁隐公元年之后相比较少。其中晋国所记大事最多,共有九件。除晋穆侯四年(前808)“取齐女为夫人”、七年(前805)“以伐条生太子仇”、十年(前802)“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二十七年(前785)“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晋殇叔四年(前781)“仇攻杀殇叔,立为文侯”,还有上引《左传》桓公二年所说从鲁惠公二十四年到四十五年在晋国发生的几件大事。其他较多则为周王室和秦、郑、卫;周王室在这之间发生的大事包括“共和行政”共有六件,秦国发生的大事有六件,郑国有五件,卫国有三件,其余鲁国一件,宋国一件,陈国一件,也说明其他侯伯之国从共和之后已有简略的历史记载了。章太炎所论“列国之有《春秋》,晋为最早,而秦、郑次之,宋在其后,齐、鲁更后”,于此便可看到根据了。

从上可见,章太炎所说“盖列国之有《春秋》,晋为最早”是有道理的。晋国记述历史的传统可以追

① 章太炎:《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151页。

溯到西周后期,不仅上述《左传》所记晋国穆侯、殇叔的大事是在共和之后、春秋之前,同时西周末以来专记晋国历史的古本《竹书纪年》也是以晋“殇叔”作为晋侯之首开始的,晋殇叔元年是公元前784年,也是在春秋之前;而且西周晚期晋侯稣钟铭文也有这样的记载:

隹(唯)卅又三年,王親(亲)適省东或(国)、南或(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償(潰)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汜^①(汜),分行。

王親(亲)令晋侯稣:率乃自(师)左洧(和)^②北海□伐夙夷。晋侯稣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

王至于鬴城,王親(亲)远省自(师)。王至晋侯稣自(师),王降自车,立,南卿(向),親(亲)令晋侯稣自西北遇(隅)敦伐鬴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秩人先陷入,折首百,执讯十又一夫,王至,淖淖列列夷出奔。王令晋侯稣率大室、小臣、车仆从,逋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隹(唯)反(返),归在成周。

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立(位),王乎(呼)善(膳)夫曰:召晋侯稣,入门立中廷,王親(亲)易(赐)驹四匹,稣拜稽首,受驹以出,反(返)入,拜稽首。丁亥,旦,王郈(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各(格)大室,嗣(司)工扬父入右(佑)晋侯稣,王親(亲)赏晋侯稣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

稣敢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作(作)元稣(和)扬(扬)钟,甞甞降余多福。稣其迈(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③

晋侯稣编钟铭文共有1套16枚,铭文共达342字,

完整地记载晋侯稣率领晋军在周宣王的亲自指挥下打败夙夷和侵犯鬴城之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晋侯稣编钟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记载时间语词的高王年以及五个有月份、“月相”、干支的术语。

隹(唯)卅又三年,王親(亲)適省东或(国)、南或(国)。

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

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格)成周。

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償(潰)往东。

三月方死霸,王至于汭,分行。

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立(位)。

丁亥,旦,王郈(御)于邑伐宫。

这件西周晚期的晋侯稣编钟铭文不仅有高王年“卅又三年”,还有五个基本连贯的记载月份、“月相”^④和干支日的时间语词“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死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这对于研究西周历法特别是月相的作用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把记时与记事语词充分结合的记述方式正好与编年体史学体裁相合,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笔者认为,上面所引晋侯稣编钟铭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总述周王三十三年巡省东国南国以及周王从一月到三月所至具体地点;第二段叙述周王亲自命令晋侯稣率军伐夙夷;第三段写周王命令晋侯稣伐鬴城;第四段写周王赏赐晋侯稣;第五段写晋侯稣做编钟扬王之美并颂祖祈福。这五段中除了最后一段与编年体史学体裁关系不大外,前几种皆与之有重要关系。

首先,晋侯稣钟铭中头一句“隹(唯)卅又三年,王親(亲)適省东或(国)、南或(国)”正是第一种编年体方式:记载周王三十三年一件大事。而且这一句也可以说是晋侯稣钟铭的主题。这与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及《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中“(秦昭王)二年,攻皮氏”的

① 此字或读为上“艸”下“申”的字,笔者认为依字形应隶定为“艸”,读为“汜”。

② 此字读为连词“和”,为笔者新释。“洧”从“获”得声,“获”声母为匣母,铎部,“和”为匣母,歌部,二者为阴入对转,可以通用。

③ 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1册第35—50号,第60—87页。

④ “初吉”有的学者认为是月相,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月相。如果把“初吉”看作月相,晋侯稣编钟铭的便有五个月相;如不看作月相,那么此钟中就只有四个月相。

编年体记述形式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上引晋侯稣钟铭中的大事记及前面月、月相及干支日,实际上与鲁《春秋》类体例是一致的。例如:“隹(唯)卅又三年,王窺(亲)遯省东或(国)、南或(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償(潰)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蒺,分行。(中略)王窺(亲)令晋侯稣:率乃自(师)左洧(和)①北洧口伐夙夷”,“王至于酇城,王窺(亲)远省自(师)。(中略)窺(亲)令晋侯稣自西北遇(隅)敦伐酇城”。《春秋》类编年体史书是以某王或某君为核心来安排并记载历史大事的。尽管晋侯稣钟作器主人是晋侯稣,但从晋侯稣钟铭文的头一句看,这组编钟所记述的核心是周王。这样看来,能够进入《春秋》类编年体史书的就应该是上面加点词的时间语词及大事记部分。

再次,除了上面两部分外,其余的内容比较详细地叙述几场战争参加人员、战争进行情况、战争胜利及战俘等,这些应是《左传》等编年体史书所使用的通常体例。

但是也要看到,大概到西周晚期出现的把记载年月日月相等时间语词和大事记合在一起的编年类史记方式是有局限性的。晋侯稣钟铭文大概就像《左传》桓公二年所记鲁惠公年间晋国发生的历史大事记一样,前后都是不大完整的,还缺乏像《春秋》那样由史官逐年记载历史大事记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这时即使出现了编年体记事方式,也是不成体系的,还没有出现比较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当然,对西周晚期把历史大事记和年月月相干支日两大要素结合起来连续记载历史事件的做法,理当予以充分的关注,因为春秋编年体史书恰恰萌芽于此。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宋媛)

The Historiographical Meaning of the Wording “Annual”年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WANG Hui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written documents as well as the statement in *Mencius* tha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rises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re had had no such historic records in the annalistic style as that embodi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for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 B. C.), but the two key factors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annalistic style, namely, the date of day, month, and year and the chronicle of national events, had already appeared then. This phenomenon suggests that people had had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o select some big even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levant year during the due period, a symbol of maturity of the annalistic recording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presence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for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emporal factor of historic event in Chinese history is unique in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ronze inscrip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istorical records in annalistic style; annual recording of big event

① 此字读为连词“和”为笔者新释。“昏”从“夔”得声,“夔”声母为匣母、铎部,“和”为匣母、歌部,二者为阴入对转,可通用。